第四届世界杭商大会大咖说

李 慧/整理

【编者按】世界杭商大会是杭州为凝聚杭商力量、搭建合作平台、打响杭商品牌，实现杭州与杭商共赢发展而设立的重要活动。第四届世界杭商大会期间，知名杭商畅叙杭商精神，共论后疫情时代的杭商机遇。以下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董事长王建沂，紫光集团联席总裁兼新华三集团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的演讲实录。

王坚——拥抱数字化浪潮

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如今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谈论数字化，一个叫产业数字化，一个叫数字产业化，其实两者都是城市数字化的结果。

时代更替不是简单的新技术替代老技术。电气化到数字化，对中国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电力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指标，如今中国一年的发电量超过美国、日本、俄罗斯三个国家的总和，但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和发电量相当的程度，中间缺少了技术的发展。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这些技术如何来支撑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技术体系。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最大的机会，不止是单项技术的发展，而是一个新的技术体系的形成。

今天太平洋两岸的科技竞争，很像当年大西洋两岸的竞争。英国为了保持技术上的先进性，限制了纺织机械甚至图纸的出口，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同样的，无论是电的发明、铁路的发明，还是汽车的发明，都在欧洲实现，但是美国最先进入电气化时代，成为车轮上的国家。我们正处于互联网时代，即将步入下一个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相关技术并非最早在中国产生，就像当年的电力并非在美国诞生一样，但我认为中国相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背后有两个根本的变化至关重要。

第一个变化，是大家老生常谈，却没有去深究的数据问题。实际上数据的意义和内涵，远远超出了过去专家学者们所谈论的大数据范畴。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第一份要素市场化配置文件，把数据纳入了生产要素范围，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每发现一种新的要素，人类社会都会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在中国，我们有能力把要素对社会经济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如今的数据，不是简单的硬盘数据，不再只跟互联网公司联系在一起，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素问题。

第二个变化，跟杭州有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的城市开始。同样的，电气化能够在美国完成，有一个城市功不可没。纽约是马力时代跟电力时代的分水岭城市，在全球率先将电作为照明来源，后来又有了电影院、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气化给城市带来了繁荣。电力作为基础设施代表，在城市和国家每一次关键的发展阶段，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电以后，大家才发现可以实现更多的创新。

至于杭州，不仅要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也提出要打造数字治理第一城。总结起来，城市数字化是所有新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今天，全世界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到2050年，这个比例会上升到80%。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城市人口承载力也增加了100%，这给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巨大机遇。我希望杭州能像纽约一样，抓住时代更替的机会，成为全世界城市数字化的标杆。

美国一个著名的建筑师曾说："世界上没有人需要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直到贝多芬把它创造出来。"艺术创新是这样，工业创新也是这样，当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不是我们能设想到的，创造决定一切，杭州恰恰有这个机会。

我认为，杭州的创新非常特别，是将信将疑的、坚定的尝试，也就是说虽然存有疑问、没有把握，但大家都努力去干。"无中生有"，我也有亲身体会，做云计算的时候，起初大家不知道该干什么，但最后还是做起来了。"城市大脑"这个词最先从杭州冒出来，后来慢慢地被大众所接受。所以杭州乘着数字化时代的浪潮，可以大胆来做创新这件事。

我深刻地感受到，如今杭商的"商"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里的"商"了。改革开放初期，我有一次坐远洋客船，碰到外出做生意的人，其中很多人是弹棉花的，而本届杭商大会上台领奖的人，已经大幅提升了"商"的概念。

杭商的"商"字落在"杭"字上，我认为企业家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使命，就是把所在的城市变成创新的载体。通过大家的努力，在未来50年甚至100年后，回过头来看这座城市，会发现杭州在历史上为世界的创新做出过贡献。引领城市走向下一个时代，我觉得"杭商"也会被重新定义。

王建沂——危机遇新机，变局开新局

天下杭商幸逢盛世，共襄盛会，感谢杭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支持和爱护。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和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杭州市委市政府高规格召开第四届世界杭商大会，是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落实省委忠实实践"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具体行动。

杭州是数字变革的策源地，杭州正在勇当科技创新的探路者，正在探索建设科技特区，提升科创平台的能级，构建全域创新生态，争创市场经济最优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双循环新的发展格局下，广大杭商如何在危机中遇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围绕今天会议的主题，我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坚定不移拥护党的大政方针。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领会和落实国家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重大政策，凝聚政治共识，保持政治定力，树立家国情怀，坚定产业报国、实业报国。主动围绕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中心，服务杭州市经济发展大局。

二是坚定不移勇于创新。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和转型升级，将各行各业打造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创新主体和发展主体，抓住"两新一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争当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三是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企业。遵纪守法保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坚持诚信守法，提升法制意识、契约精神，积极参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好"六稳"，落实"六保"。

四是坚定不移地拓展国际视野。积极参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扎根杭州，放眼世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面向"一带一路"，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锻造国际一流的企业。

五是坚定不移地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主动投身精准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参与助力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楼观沧海日，门对钱江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开启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让我们化壮志为行动，付豪言于实践，拥抱新时代，勇当弄潮儿，实现新飞跃，创造新辉煌，为杭州努力建设世界名城，奋力展现重要窗口头雁风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于英涛——创新是生命线

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创新是生命线。对于新华三来说，创新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我们能够屹立在科技之巅的护城河。

新华三是中国第二大服务器生产厂商，去年在研发领域投资超过50亿元人民币，我们平均每天有四项发明专利产生，连续7年蝉联浙江省百强创新企业第一。创新是我们维持生存的根本，但又面临着诸多困难。

在中国ICT领域，我们跟另一家企业并驾齐驱，占据了中关村企业80%的市场份额。再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方向性的把控、国际视野的建构，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而更多的困难在于基础科学。

我们国家的基础科学还存在薄弱环节，尤为明显地体现在芯片、通信、医药等领域。我国每年有800万应届毕业生，是美国的两倍，但我们自然科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跟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些困难。好在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大量的工程师红利，而且中国人聪明勤奋，我相信这些困难终究能够克服。

规则意识是创新的另一大要素。中国人参与全球竞争、国际循环，要尊重国际规则和知识产权。我们不仅要尊重国外的知识产权，更要注重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创新。因此，创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身体力行。

谈到芯片领域，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我们紫光集团旗下的企业，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芯片设计制造公司，专注于3D NAND闪存的设计和制造，已经从32层、64层、96层，做到了目前的128层，基本实现跟全球接轨。今年11月，新华三装载有长江存储3D NAND闪存固态硬盘的整机将会面市。虽然我们的技术已经比较先进，但良品率还需要提升，这方面较国外芯片公司还有一段差距。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ICT企业之一，有超过60%的芯片、中间件、操作系统用的是国外的系统，因此在2020年，整个行业都受到了中美关系波动、海外疫情蔓延的大力冲击。为了保持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公司围绕产业链上游扩张，开展垂直化的产业链布局。中央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以新基建拉动的财政、金融等产业政策、人才方面的政策等，给国内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双循环"的新格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措施，也会给新华三的未来发展带来机遇。我们作为诞生于杭州，成长于杭州的企业，定将为杭州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负起我们领军企业的责任。

姚洋：国际环境变化和双循环下的企业机遇

▶▶▶[紧接A1]

共通的地方。技术竞争，要以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规则来和平竞争；我们看到经贸、金融领域的情况，是更多的融合，而不是脱钩。这是我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看法，国际环境在变，但绝对不要夸大，如果夸大了，我们做出的决策恐怕就会出现偏颇。

未来5到7年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紧急周期，现在我们的经济开始复苏，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7%以上。我们大体可以判断一下，假设美国经济增长率是2.2%，通胀率2%，中国通胀率以美元计价，算上人民币的升值，有三个预测：如果我们保持高增长，到2025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接近美国；如果我们是中增长的话，到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低增长的话还差不到2万亿美元。所以在2027年到2030年之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再往远一点预测，我们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中国GDP总量要超过美国的2倍，中国的人均收入要超过美国的一半，中国的GDP总量要达到世界的1/3，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未来5至10年里，我们的"双循环"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应该依赖市场搞创新。今天表彰的企业家，都是在市场里头摸爬滚打出来的民营企业家，20年前没有人知道阿里巴巴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没有人能想到马云会成为今天最富有的人，市场给了他机会。而政府应该把资金组合起来，帮助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成熟但是缺钱的企业。

芯片领域，我们还处于追赶阶段。芯片工艺太复杂，失败率高，该领域的关键是竞争良品率，我们的良品率是60%，人家是80%，这样永远干不过人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断试，试就需要钱，有钱了才可以去试，所以需要政府的帮助。

华为、紫光等都是世界顶尖的企业，但我们的芯片设计还是受制于人。虽然我们在碳基材料方面有所突破，但是要达到使用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晶圆材料主要依靠进口，晶圆加工也是我们落后较多的领域，ASML可以制造5纳米的光刻机，我们的上海微电子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但差了好几代。中芯国际能够制造14纳米的，他们的人马来自台积电，资金来自中国大陆，但和台积电还有差距，台积电已经有5纳米的制造工艺。

我们要理性地认识中国在芯片行业所处的地位，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低端芯片领域，我们国家还是有可能慢慢赶上的。低端芯片是主流，40纳米以上的芯片占到了全球销售额的78%，7纳米的芯片只有我们高端智能手机才用，很少有采用5纳米的手机，一般我们的工业用8纳米就够了，根本用不着高尖端的芯片。我们现在用掐脖子技术作为标准来搞突破，这个标准太宽泛，我觉得在关键领域摆脱美国的约束、不受美国的限制就可以了，比如晶圆材料主要由日本生产，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日本的晶圆材料夺过来？我觉得没必要，中国太大了，别的国家看到我们的企业发展起来，心里都害怕，但凡中国做的产品价格猛降，他们就不用做了。

第二，提升国内消费。我们的消费力上升非常快，但我们的储蓄率下降也非常快。按照现在这个下降的速度，10到15年，我们的储蓄率将下降35%，这个比例是现在韩国的水平，但是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的一半，而我们超过美国的一半要到2049年，所以我们还需要储蓄。笼统地说，我们应该挖掘国内消费的潜力，调整国内消费的结构，尤其是中低端的。

中国家庭收入分配调查的数据显示，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35%，相当于财富的近70%。5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占16%，1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占了0.4%，所以最低和最高之间差了87倍。当总理说我们还有6亿人生活在月均收入1000块钱以下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所以提升5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是未来15年我们要做的事情。

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终极目标，就是全面建成现代化。什么叫全面现代化？不仅要看收入，还要看老百姓有没有保障，有没有安居乐业。全民社保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真正的城乡统筹一体化，但难度非常大。我认为应该实行统一但是有差别的社保体系，给人家一个菜单让人家自己去挑，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全国统一。我们的地区差异太大了，我听说深圳的存款是6000亿，但是东北地区早就亏空了，需要中央政府的补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有差别的政策，还要重视低收入阶层的救助，这次疫情导致很多人丢了工作回去农村，将来城乡一体化，显然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我们还要推进城市化。按照标准计算，我们的城市化率应该是72%，刚好是日本和韩国达到我们国家目前收入情况的城市化水平。但是按照我们常住人口的比例统计，中国的城市人口占60%，按照户籍人口统计，这个比例不到45%。我们农村劳动力也只占全国劳动力的28%。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是低质量和滞后的，我们测算到2035年，中国城市化应该达到75%~80%的标准，中西部还有2亿多人要进城。

将来城市化该怎么走？要城市区域化。8月2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有9名专家发言，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教授发言具有指标性，他有一本书叫《大国大城》，讲的是大城市化。今后我们的城市化就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区域，我们的城市化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武汉、长沙、四川盆地、关中平原、京津冀、辽东半岛、河南围绕郑州打造十字核心区……理想的状态是到2035年，这些地方集中60%~70%的人口。我们国土面积那么大，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人口呢？日本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的人口加起来，就占到了总人口的60%~70%，这是人口要集中的概念。

第三，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碳减排目标，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近期和远期的严峻挑战，比如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所谓的新能源其实用的是旧能源，要用电，而我们国家90%的电力来源是火力发电。所以新能源汽车越多，烧煤越多，要改变这个状况，就得替代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所以习总书记一宣布这个碳减排目标后，真正的新能源企业市值猛增。对企业有什么影响呢？恐怕我们不得不全面征收环保税、环境税或者叫碳税，如果企业排放太多，就要及时转型。这是一个硬性指标，也是我们企业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最后我认为，首先我们不能把底线思维变成我们常规的经济政策，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也就是三线建设，对形势的判断不是很准确，最后基本上失败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不等于不要国际循环。我们要通过开放，加大美国脱钩成本，就像我们开创了金融市场，让很多美国金融企业进来，帮我们说话。30年前美国和我们脱钩很容易，因为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多少联系，但今天脱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很多自媒体说，我们今天好像有被世界孤立的倾向，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的战略定位，我们应该回去重新拣起韬光养晦来。这种说法好像有道理，但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大象难以躲在树后，中国是一个大象，不是小兔子。

那中国该怎么做呢？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有所作为。当然我们也要转变观念，以前我们是规则的接受者，只要顺应规则就行了，但以后我们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要以这种心态去迎接新的百年不遇的挑战。如今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美国也不认同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了，那么最大的两个国家先坐下来谈，谈好之后就极有可能促成新的全球规则。

（李慧/整理）